

過去、現在與將來

陳立夫

歷史原不過是一串可歌可泣事蹟的紀錄，也不過是若干人的偉大理想的實現，國家是如此，個人也是如此，所以一個人凡是過去有了偉大的成就，他一定能充滿了自信心，而且一定對於他現在的生存，覺得非常有意義，更如一個人有了遠大的抱負，他絕對不會灰心，而且會不斷努力向前奮鬥，來實現他理想的目標。

前者是有了光榮的過去，後者是有光明的將來，有其一即可產生光輝的現在，有其二則光芒萬丈的現在，必定能立刻呈現出來。

「現在」，不過是一剎那間而已，是一剎那之前的將來，再一剎那間現在也就成了過去。所以在生命的過程中，即使是一剎那的時間都是寶貴的，不容輕易放過。設若一個人自己覺得全無光榮的過去，那末，他過去所活的時間都是空過了；同樣，一個人如果自己覺得全無光明的將來，那末，他現在也儘可不繼續活下去了。所以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將來，同樣非常重要。而且只有從過去的光榮和將來的光明之中，才能產生現在的光輝；才能使我們現的「生」有其意義，有維持的可能與繼續的必要。因此，我們應該體認一個原則：「從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將來中映射出光輝的現在！」

愛護一己的歷史的人，必知自愛，因為道德是最多情也是最無情。蓋「相對的雙方一定共同存在」（易理之一），我們知道道德的表現是博愛，當然是多情；但是假定你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一旦忽然做了一件大惡事，前面的九十九件好事，就會被一筆勾銷，所以我稱他也是最無情。因此，一個人有了光榮的歷史，必得自愛，自愛才能保持他以往的歷史，而

發出現在的光輝。

個人如此，民族國家亦然。國民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不以己國的光榮歷史為值得驕傲，怎能希望他對於國家有愛護之心。我們不幸，曾經做了一世紀的殖民地，許多人受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影響，在學校裡放棄歷史不講，在社會上天天做毀壞己國歷史的工作，使一般青年對於國家民族歷史產生懷疑觀念。當年我未到教育部以前，沒有想到事態有如此之嚴重，一到了那裡才發現我們的專科以上學校各系，所最不重視的就是本國的歷史。經濟系無中國經濟史，政治系無中國政治制度史，農業系亦竟無農業發展史，在一個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依農為生的國家，豈不奇怪。甚至於歷史系其對於外國史之重視遠勝於本國史，對於國文，更是隨便，你看這還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嗎。歷史忘了，使得你和過去毫無關聯，不是一條「線」下來而成了飄飄蕩蕩的一個「點」，這一點自然到處可以落腳，自然可以成爲任何國家的子孫，不一定是中華子女。我才明白要毀滅一個民族，必須先毀滅他的文化，而毀滅文化，必須先從歷史毀起，我於是下大決心，先將每一科系的歷史課程重建起來，置之爲必修科，當然我遇到了不少阻礙，但是信仰就是力量，終於我戰勝了。

我再和受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洗禮者作戰，我對於假借求真求實之名，說這部書是偽造的，那一段歷史是假的，那一個人是不存在的，祖宗是不應追祀的，弄得對於以往幾乎沒有一件事是可以相信的，甚至於全國所有水利工程所在地，人民所崇敬而建廟追祀的大禹，也有人居然說他沒

有這樣一個人而是一個蟲。我知道孔子是不隨便推崇人的，沒有真憑實據，他是不寫作的，他對於大禹則是推崇備至，說：「禹，我無間然矣。」我于是去找指大禹是蟲的歷史學者顧頡剛先生，請他考據我國最偉大的工程師大禹的生日是何年何月何日，以備提中國工程師各學會聯合年會，預備拿這一個日子作為工程師節。他考據了以後，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某年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我就根據他的信提出工程師聯合年會，經全體會員一致通過，我隨即宣佈，從是日起大禹不再是個蟲了，因為蟲的生日是無法知道的，這是顧頡剛先生負責考據出來的，有信為證，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這樣我就救了顧頡剛先生，現在每年六月六日舉行的工程師節就是這樣來的。現在還有少數人，以甲骨文的殘片隻字，來作修考歷史的證據，其求真的精神，固然可佩，其只信古物不信古人的辦法，其所得是否可償所失，則有待商榷。歷史毀了，我們還有什麼來自信，我們固然不必倚賴祖先，應該靠自己努力，但是毀滅祖先，是否可以換取他人的尊嚴，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在國外時，看到人家買一條狗必先考其世系譜，如其三代祖先均曾得比賽優勝獎，則此犬之身價十倍；賽馬場之馬，如出諸傑出之世系，則信其必大有作為，其價值驚人，最高者竟逾百萬美元之多。乳場之牛，亦必以優良純種為首選，此即說明品種與歷史之可貴也。物種如此，何獨至于人而疑之？他人均知以有偉大祖先為榮，惟獨吾國有若干士人竟視本國之歷史文化如敝屣，詆毀之、懷疑之、破壞之，無所不用其極，似乎以自己有光榮的歷史為可恥，有偉大之祖先為不足道。此種變態之自卑心理，實使人欲哭無淚，苟非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之腐蝕，曷竟至此。

睡了一世紀覺的中國，人家跑到前面去了，我們馬上拔步追趕尚且怕來不及，為什麼還要化費這麼多寶貴時光把過去的光榮史蹟加以摧毀呢？站在國家的立場，祖宗和我們是一體的，他們的光榮就是我們的光榮，我們現在的努力所映射出的光輝，還是與他們的光榮併在一起算作中國的光榮。倚賴祖先，固然可恥；詆毀祖先以求自耀，則尤為可鄙。

人類社會的一切創造並不是從天掉下來的，思想必有其淵源（時間），亦必有所借鏡（空間），不過其組織具有新的成份而已，真正的創造者絕不會受過去的約束，而是極有可能受未來的誘導。

圍棋為中國所發明（傳為堯所創，紐約時報有此考據），在中國文化沒落的階段，中國圍棋在國際間成為日本的特有技藝，及至中國文化一露復興曙光，其錦標立即重複回到了中國人的手裡。其他各種球賽如桌球、高爾夫球、少年棒球等，有的雖然不是我國所創造，也居然奪得國際的錦標，這是憑國人的智慧高超所致，而智慧的高超，乃是數千年文化孕育所成，絕非偶然所能倖致！所以現在的光輝，還是從過去的光榮的潛力得來的。講到未來，在個人要立志，「有志竟成」是人人所知的一句成語，何以立志如此重要，因為有了目標，才確定了行的方向，於是從起點到終點之間，所有人和物都可以成為有力的幫助者。譬如我要從天母去臺北，我不認識路，但是一問路上的人，會告訴我往那一方向走，乘那部公共汽車，路上牌子都會指引我的前進，若是我沒有目標，那一切一切與我無關，幫不上忙。所謂「天助自助者」就是說「環境（天）會幫助自己幫助自己的人」。有了目標，就有光明的遠景，有了光明的遠景，才有奮鬥的勇氣，歷艱險而不灰心，遇障礙而不退却，終能達到預定的目的，大學裡所說的知止，就是指此：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這就是有志竟成的最好說明。

個人如此，國家亦然，國父所倡之三民主義，就是替國家立了一個大志，由于這個大志的樹立，所以才有無數同志的集合，首先推翻了滿清的專制，建立了民國政制，打倒了軍閥，取消了不平等條約，戰勝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因為三民主義啟示了我們光明的未來，對自己要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對外要建立一個平等自由的大同世界，所以我說光明的將來會映射出光輝的現在。

滿清政府沒有理想也沒有目標，所以我們大家也就沒有努力的方向。以後，國父的三民主義的理想成為我們建國的目標，有了目標，於是一切都成了我們的助力，如不平等條約之自動取消，這就是「能自助然後人助之」的最好例子。而且全國國民有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有了共信，有了共信，才會有互信，有了互信，才會團結，戴季陶先生曾說：「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是證明光明在將來，會產生光輝的現在啊！

十幾年前，我在美國應邀向一個名稱爲「上海午餐會」的民間團體講話，這是曾經居留上海的美國人士所組成的團體，那時我曾指出稱：「一旦毛匪開始要打倒孔子時，將是他最明顯的毀滅的開始」，以後他搞文化大革命，要澈底排斥中國傳統，他以為打倒孔子即可使毛澤東思想起而代之，實則適得其反，排斥中國固有文化也就是要排斥自己的根本，結果將一無所得。易經中說二個相對的東西是同時存在的，毀滅過去，亦即是毀壞將來，不愛惜自己過去的人，必無將來。不愛惜自己文化的人，如何能創造未來。

現在，仍有人在談小腳，雅片，以這些微不足道的現象來討論中國文化。中國婦女纏小腳和西人束細腰有什麼不同，鴉片是由外人強迫輸入，吾人爲拒絕他而發生了戰爭，這能代表些什麼中國文化？若以此譁衆取寵，爲個人出風頭，但將不免被外人所恥笑，不愛惜自己文化，不尊重自己的人，將難以獲得他人尊重。

有一次我在美國礦裡做工，一個美國同事要我找一個鋤頭，我找到的一個，恰好略有破損，這位同事心有不滿，於是說：「陳！這個破鋤頭正好像中國」，我聽了立刻把這個鋤頭打了過去，於是兩人打起架來。工頭來問究竟，我就告訴他事情經過，我並強調說：「他譏笑我個人，那沒有關係，但他譏笑我的國家，我不能忍受。」工頭聽了立即說：「陳！你打得對。」從此以後，礦中同事誰都不敢欺侮我了。這件小事情，頗足以說明自助助人助與自尊人尊的道理。我們今天如還不知自尊和自強，真不知道何以開拓將來。

國父曾說「把我們的固有道德智能從根救起；把西方的物質科學迎頭趕上，」這真是二句至理名言。此二者並不衝突，前者爲證實過去的光榮，後者是創造未來的光明，彼此可以並行而不悖。從根救起並無妨礙於迎頭趕上，目的都是在充實現在的光輝。

上次我在東方雜誌發表「我爲什麼要做這樣一件事」乙文，說明要翻譯尼頓氏中國科學史的動機及理由，這道理很清楚，就是要使國人以及全世界都瞭解中國過去對人類的貢獻，從而鼓舞國人現在努力的勇氣，進而創造一個美麗的未來。

我希望在現在我們所努力的着力點上，不妨分二部份，使一部份人致力於發揮吾國固有的道德智能，做從根救起的工作；另一部份人竭力發展科學，從事實業建設做迎頭趕上的工作，彼此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有其一，就可發揮出現在的光輝；有其二，則必將使「現在」展露出萬丈光芒。所以我說：

「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將來映射出光輝的現在！」

王壽南博士著

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

之研究

全書一〇二〇面
售價二四〇〇元

本書重點在統計自唐睿宗景雲二年至唐亡之間，每一時間與每一地區的藩鎮對中央採取何種態度，並探討何以產生該種態度的原因。本書共分十章，第一章說明藩鎮之意義與建置之目的及方鎮建置沿革；第二章分類統計藩鎮對中央之各種態度；第三章研討藩鎮之職權；第四章研討藩鎮武力強大及對中央態度的關係；第五章研討唐末藩鎮之本質與其跋扈之態度；第六章研討中央與藩鎮間之經濟關係；第七章研討河北三鎮之獨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第八章研討中央之策略措施與藩鎮對中央態度的關係；第九章研討唐代士人與藩鎮的關係；第十章爲綜合性結論，並研討中國古代專制政體下政治權力之爭取與藩鎮對中央各種態度形成的關係。書末附錄一「唐代藩鎮總表」，將全部藩鎮資料列出，共計五五二頁，其內容之豐富詳細，實超過吳廷燮氏之唐方鎮年表，爲研究唐史所必須參考之資料。

總經銷：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
郵撥第一六五號